

“休眠”与“游击”： 辽东与辽西东北抗联组织形态差异的地理社会学考察

郝德才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

DOI: 10.65285/RWYSHKX.V2I3.005

摘要：本文从地理社会学的交叉视角考察1930-1940年代东北抗日联军在辽东与辽西地区形成的差异化组织形态及其生成逻辑。研究发现，抗联并非采用统一模式，而是基于两地迥异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结构，演化出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辽东（今丹东、本溪、通化周边）山高林密、毗邻朝鲜，抗联依托复杂地形与跨国纽带，发展出以杨靖宇部为代表的“半公开游击模式”，维持较大建制单元的机动作战；而辽西（今锦州、朝阳、阜新周边）低山丘陵、接近关内、日伪控制严密，抗联则采取以“休眠细胞”为主的隐蔽模式，化整为零，长期潜伏。

关键词：东北抗联；组织形态；地理社会学；辽东；辽西

"Sleep" and "Guerrilla": A Ge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al Differences of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in Liaodong and Liaoxi

Decai Xi

Party School of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aon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fferentiat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ir formation logic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AJUA) in Liaodong and Liaoxi regions during the 1930s-1940s through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sociology.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AJUA did not adopt a uniform model but developed distinct survival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each region. In Liaodong (modern-day Dandong, Benxi, and Tonghua areas), characterized by dense forests and proximity to Korea, AJUA leveraged complex terrain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to establish a "semi-public guerrilla model" represented by Yang Jingyu's unit, enabling mobile operations with large-scale organizational units. Conversely, in Liaoxi (modern-day Jinzhou, Chaoyang, and Fuxin areas), with its low mountains, proximity to the Guannei region, and tight control by Japanese puppet forces, AJUA adopted a covert "dormant cell" strategy, breaking down into smaller units for long-term infiltration.

Keywords: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geographical sociology; Liaodong; Liaoxi

前言

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动范围覆盖辽阔的东北地区。然而，深入历史细节即可发现，抗联的组织与斗争形态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特别是在地理相邻的辽东与辽西地区，抗联分别形成了以较大规模单元开展机动作战的“半公开游击模式”和以高度隐蔽、分散潜伏为特征的“休眠细胞模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形态。传统的军事叙事通常侧重于领导体系、战役过程和精神动员，难以充分解释为何在同一领导架构和斗争目标下，会衍生出如此不同的生存策略。这一现象引出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塑造了抗联在辽东与辽西的组织分化？研究认为，地理环境（包括地形、生态和区位）与社会结构（涵盖人口分布、民族构成和社群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导致这种差异化适应策略的关键机制。为此，文章引入地理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强调“空间”并非消极的背景板，

而是能动的、与社会力量相互建构并深刻影响组织行为的关键变量。

一、辽东案例：山岳、密林与跨国纽带下的“半公开游击”模式

（一）地理环境基础

辽东地区（今辽宁省东部及吉林省南部）独特的地理环境，为东北抗联实施“半公开游击”模式提供了关键自然条件。首先，地形赋能显著。作为长白山余脉，这里山高林密、沟谷纵横，茂密的原始森林与复杂地势构成了天然屏障和机动空间。这种地形极大限制了日伪军大规模围剿及机械化部队行动，却为抗联隐蔽行军、突袭作战和秘密营地建设创造了理想条件。依托于此，抗联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密营系统，成为保存实力、休整部队的战略后方。其次，生态资源提供持久支撑。广袤山林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狩猎、捕捞和采集成为补给粮食的重要途径；山区盛产的草药，也为救治伤员、防治疾病提供了基本保障，

有效缓解了敌人封锁下的物资短缺。再者，区位优势形成战略纵深。该地区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这条边界成为抗联重要的迂回空间。面临重兵压境时，部队可转移至朝鲜境内短暂休整。同时，这一区位便于抗联与朝鲜革命力量建立联系，获得人员与物资支援。众多朝鲜志士的加入，使抗联第一路军等部队具备了国际色彩，拓展了生存与发展基础。

（二）社会结构支撑

特定的社会结构为抗联在辽东地区的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撑。首先，分散的村落与流动人口构成了隐蔽活动的环境基础。辽东山区地广人稀，村落分布零散，采参人、猎户、伐木工等流动群体活跃其间。这种社会结构使外来人员易于融入，抗联小股部队得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获取情报与物资，并借助人口流动性有效掩护自身行动。其次，朝鲜族社群成为抗联最关键的社会依托。作为该地区传统聚居群体，深受殖民压迫的朝鲜族群众具有强烈反日意识。他们凭借语言与文化优势，为抗联承担侦察、联络、后勤等任务，其跨国亲缘网络更成为建立秘密交通线和获取境外情报的重要渠道。这种基于共同命运的紧密联系，是抗联在辽东生存发展的核心社会基础。最后，日伪统治的权力缝隙为抗联提供了生存空间。尽管日伪通过“归屯并户”等手段强化控制，但其统治效力随地理距离递减。在偏远深山区，行政控制与军事存在显著薄弱，形成权力“半真空”地带。这些区域成为抗联建立游击区、开辟密营和开展半公开活动的战略依托。

（三）组织形态特征

在上述地理与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抗联在辽东地区形成并维持了一种独特的“半公开游击”组织形态。首先，能够维持较大规模的作战单位。与辽西等地的极度分散不同，辽东抗联（尤其是第一路军）在鼎盛时期能保持军、师级建制。例如，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曾下辖数个师，兵力达数千人，使其有能力组织如奇袭老岭隧道、攻占抚松县城等较大规模的战斗，对日伪构成有力的军事打击。其次，具备建立固定基地的能力。依托有利地形和群众基础，抗联在辽东建立了功能齐全的密营系统。这些密营不仅是藏身点，更包含了指挥部、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粮仓等功能分区。像“蒿子湖密营”等，都是规模可观的后方基地。这种相对稳定的基地，是维持大部队和长期斗争的物质保障，也是该模式区别于纯流动作战的关键。最后，呈现出动态的“半公开性”。在抗联活跃的核心区，其存在对当地百姓是“公开的秘密”。部队能相对公开地进行宣传、动员，甚至建立抗日组织，并向村屯征收粮饷、购买物资、获取情报。这种与群众的公开联系，是区别于辽西“潜伏”模式的根本特征。当然，这种公开是动态的，一旦敌军压境，部队便迅速化整为零，潜入深山。这种在公开与隐蔽间灵活切换的能力，正是其组织韧性的高超体现。

二、辽西案例：丘陵、走廊与严密控制下的“休眠细胞”模式

（一）地理环境约束

与辽东形成鲜明对比，辽西地区（主要包括朝阳、阜新、锦州等地）的地理环境，深刻制约了东北抗联在此开展大规模武装活动，并塑造了其独特的组织形态。首先，地形限制极为突出。辽西以低山丘陵和河谷盆地为主，缺乏辽东那样林海茫茫的深山与纵深。这里的山体相对孤立，植被稀疏，难以隐藏大部队行踪。抗联队伍既难以进行长时间机动回旋，又易被日伪军侦察和合围。这种地形无法提供可靠的战略遮蔽，使抗联难以在此建立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其次，生态资源压力巨大。辽西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干旱少雨，物产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部队长期生存。狩猎、采集等方式难以有效弥补粮食、药品等物资短缺，部队对外部补给的依赖性强，而在敌人严密封锁下，这恰恰成为最脆弱的环节。生存资源的紧张，从根本上限制了大部队在此长期活动与作战的可能。最重要的约束来自其区位特性。辽西走廊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日军在此屯驻重兵，关东军精锐与伪满军警密集布防。为确保军事机动，北宁铁路及多条公路干线贯穿全境，交通网络密集。这使得辽西成为日伪统治最严、控制最强的区域之一，任何成建制的抗日武装活动，都面临被迅速发现和毁灭性打击的极高风险。

（二）社会结构制约

辽西地区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压缩了抗联传统群众工作与公开活动的空间。在人口与社群方面，村落大多分布在河谷盆地和交通线附近，相对集中，这与辽东山区的分散村落形成对比。日伪推行的“保甲制度”和“集团部落”政策在此地得到强力推行和严密监管，实行十户连坐，强化了基层控制。社会监控网络无处不在，陌生面孔和异常活动极易被察觉和上报，使得抗联人员难以像在辽东那样，利用复杂的社会流动性获得掩护。在民族网络方面，辽西地区人口以汉族为主，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社群数量远少于辽东东边道地区。因此，抗联在此地缺乏类似辽东那样深厚、可依赖的、具有强烈反日意识和跨国联系的朝鲜族社群网络支撑。这一方面减少了重要的兵源和情报来源，另一方面也使得抗联队伍缺乏一个能为其提供天然掩护和群众基础的社会群体，增加了融入当地社会的难度。最后，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该地区极高的权力控制强度。日伪的军事占领、警察统治和特务渗透系统在辽西高度叠加，形成了异常高压的统治环境。镇压机器（如宪兵队、特务机关）高效而残酷，群众性的抗日活动被极度抑制，普通百姓在严酷的连坐制度下敢怒而不敢言，难以与抗日武装建立公开或半公开的联系。这种“白色恐怖”的社会氛围，使得抗联难以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公开的游击区，被迫转入完全地下的生存模式。

（三）组织形态特征

在辽西严苛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下，抗联的组织形态演变为高度隐蔽化、分散化的“休眠细胞”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活动单元的极小化。由于难以维持大部队

存在,抗联在此的活动主体转变为精干的武工队、小分队,甚至彻底分散为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的潜伏细胞。这些单元以生存为首要目标,避免军事对抗,将隐蔽性置于最高优先级。“高度潜伏”成为其根本生存策略。抗联成员以农民、矿工、商贩等合法身份深度融入基层社会,不进行任何可能暴露的公开活动。他们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长期潜伏、积蓄力量,静待时机。相应地,其功能定位也转向情报与联络优先。辽西抗联的工作重心从军事打击转为秘密发展组织、传递情报与建立交通线。他们尤其致力于构建连接冀热辽八路军、东北抗联其他区域与党中央的隐蔽通道,承担人员转移、信息传递与物资输送任务。这种模式的价值不在于歼敌数量,而在于在敌人严密封锁中打入楔子、保持联络、提供情报,为未来反攻积蓄力量。这是一种在极端逆境中,依靠非凡忍耐与纪律维系组织存在的特殊斗争形式。

三、比较与结论:地理社会结构如何塑造组织韧性

(一) 综合对比

辽东与辽西两地抗联的组织形态存在系统性差异,深刻反映了地理与社会结构的塑造作用。地理环境上,辽东凭借山高林密的长白山区和丰富的生态资源,为武装活动提供了天然屏障与补给基础,加之毗邻朝鲜带来的跨国机动空间,共同构成了“半公开游击”模式的自然条件。而辽西的低山丘陵缺乏战略纵深,资源相对匮乏,加之作为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日伪驻屯重兵、控制严密,极大限制了大部队的生存与活动空间。社会结构方面,辽东发达的朝鲜族社群为抗联提供了重要的兵源、情报与群众支持,分散的人口分布和山区统治缝隙为游击活动创造了社会条件。反观辽西,社会结构以汉族为主,缺乏类似的民族革命网络,村落相对集中且保甲制度严密,使抗日力量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依托。相应地,两地抗联在组织形态与功能上截然不同:辽东能维持军、师级建制,依托密营系统进行半公开动员与机动作战;辽西则只能以小股武工队或个人为单位高度隐蔽潜伏,主要功能转为长期埋伏、秘密发展和情报传递。这两种模式体现了抗联在不同环境下维系组织韧性的差异化路径:前者通过有限公开与军事存在展现韧性,后者则依靠彻底隐身与分散保存火种。

(二) 机制分析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发现,抗联的组织形态并非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特定地理社会要素耦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在辽东,“山岳-密林-朝鲜族网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向耦合系统。雄伟的山岳和茂密的森林提供了天然的物

理屏障和活动空间,而发达的朝鲜族社群网络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和信息、兵源、物资支持。地理环境与社会结构相互赋能,共同抵消了日伪的部分军事优势,从而支撑起一种规模较大、更具军事主动性的“半公开游击”模式。相反,在辽西,“丘陵-走廊-严密保甲”则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负向约束耦合。开阔的丘陵走廊地形利于敌方机动而不利于己方隐蔽,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招致了敌人重兵和严密监控,而严密保甲制度与相对同质的社会结构则彻底压缩了抗日力量的社会活动空间。地理环境的暴露性与社会结构的高压性相互叠加,任何公开或半公开的军事存在都难以持续,最终迫使抗联只能选择一种极度内敛和隐蔽的“休眠细胞”模式来求得生存。

因此,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于:东北抗联在辽东与辽西的组织形态差异,是其对外部地理社会环境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两种模式,无论是看似主动的游击,还是被动的休眠,本质上都是在极端压力下追求组织韧性的不同路径。它们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其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是否与本地特定的地理社会情境相匹配。这揭示了组织韧性研究的一个关键启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解,只有在具体情境下权衡利弊后的最适解。

参考文献:

- [1] 运倩茹.渤海辽东湾探区辽西低凸起带地球化学研究[C]//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全国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汇编.中海油天津分公司技术部储层地化室,2005:109.
- [2] 孙乃伟.辽宁省档案馆所藏辽东、辽西两省政府档案简介[J].辽宁档案,1990(4).
- [3] 刘雨婷.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干部“恐慌”问题研究(1927-1945)[D].吉林大学,2025.
- [4] 沈晓琪,陈君.东北抗日联军党建工作的逻辑生成[J].中国军转民,2024(22).
- [5] 张百慧.东北抗日联军:白山黑水间的不屈脊梁[J].中国档案,2025(7).

作者简介: 郝德才(1980.11-),男,汉族,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东北地方党史、区域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东北抗联与日本情报系统的对抗与演变研究(1931-1945)》(项目编号:L25BDS008)阶段成果。